

“远行的叛徒”

——论王蒙的后革命诗学观

胡 军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 王蒙是一位很有争议的文学家,其言行、思想动向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对此反应生成了醒目的“王蒙现象”。表面来看,王蒙的生活经历和多重身份是生成“王蒙现象”的重要因素,然而,就王蒙文艺思想的形成,及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和思维方式而言,具有明显的后革命性特点——理性、宽容、多元等等。他的文艺思想,是学术界勘察和研判“文革”后文学走向的一个立足点。

[关键词] 后革命时代;王蒙;后革命诗学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6-0067-05

“The Traitor of the Long Journey”

——On Wang Meng's Post-revolutionary Poetics Viewpoint

HU 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Abstract: Wang Meng was a controversial writer. His words and actions, his trends of thoughts and the responses of literary and thinking worlds have generated an obvious “Wang Meng Phenomenon”. From the surface, Wang Meng's life experiences and multi-layered identity were the major factors of “Wang Meng Phenomenon”. Nevertheless, the formation of his literary thoughts and the major spiritual qualities and way of thoughts bore an obvious post-revolutionary trait—rational, tolerate, multi-layered. His literary thoughts formed one of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survey and judge of the literary world on the trends of literature after “Cultural Revolution”.

Key words: post-revolutionary era; Wang Meng; post-revolutionary poetics

王蒙是一个有思想的文学家,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文艺思想并不为时代和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以致于其言行、思想动向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对此反应生成了醒目的“王蒙现象”。表面来看,王蒙的生活经历和多重身份是生成“王蒙现象”的重要因素。与其他作家相比,王蒙距离政治和体制

最近,除了“反右”和“文革”时期,他一直与政治保持密切联系,一直是在组织的,是体制内作家。他不满十四岁就参加中共地下党,投身革命,获得“革命作家”身份。“文革”结束后,他从新疆归来,活跃在首都政坛、文化知识界,^[1]成为新时期文坛一个标志性人物。然而,就王蒙文艺思想的形成,及

收稿日期: 2012-09-0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事”(11C0442)

作者简介: 胡 军(1971-),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其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和思维方式而言,具有明显的后革命性特点,这也是为什么他频频引起争议。因此,王蒙文艺思想中的诸如理性、宽容、多元等价值观念,只有置于后革命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惟其如此,也会更符合王蒙文艺思想的实际。

一

1979年6月,王蒙从新疆回到北京,四个月后,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文艺民主”的要求得到热烈表达。邓小平代表中央郑重提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作为一个有着极强地政治敏锐感和丰富生活阅历的人,王蒙深切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即将或已到来,他要努力重新寻找自己:“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3]

王蒙80年代的文学使命是“革命家”,他使中国当代小说重新获得了文学感觉,获得了想象力和自由感。小说《夜的眼》、《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杂色》等都以感觉见长,它们灵动、自由、舒展。当诸如“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城市的上空是夜晚的太阳”(《风筝飘带》)这类之前人们从未见过的语言出现时,一道新的文学之光划破当时文学天空,一场文学风暴不可避免。“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四五级间六七级的王旋风。评论家纷纷著文揄扬,不少青年作家王门立雪,八十年代的创作和评论上都出现了一个王蒙热。”^[4]王蒙的这种艺术感觉和创作状态持续了十年,他后来用“文思泉涌”来形容这个时期的创作:“我就像一个足球队的守门员,左一球,右一球,高一球,低一球,边一球,我在捕捉生活的灵感袭击,我左扑右抓,头顶脚踹,东踹西踹,我前后左右上下四肢五官六肺七窍望闻问切都是小说。”的确,在这些篇幅短小的作品中,王蒙“标新立异,另辟蹊径,花样翻新”^[3]。他完整地淋漓尽致地实现了自己。他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近乎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这是一次大胆地、不可重复地艺术冒险,也是一次不可重复的艺术极致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王蒙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王蒙的这一系列探索和实验小说引发文坛的极大兴奋和震动,同时,这种兴奋与震动又隐含着某种不安,这种不安当然来自对彼时封闭、模式化的创作格局和创作方法的强有力挑战和冲击。事实上,王蒙一度成为80年代文坛“现代派”的代言人,这引起了文坛某种忧虑,甚至连对文学颇为内行的“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胡乔木也告诫王蒙“不要在意识流上走得太远太偏太各色”,“少来点现代派”。^[5]但王蒙摆脱不了书生气,凭着自信和勇气、锐气和豪气,王蒙一次次向读者、文坛的容忍力挑战,在随后几年的《焰火》、《来劲》、《《球星偶遇记》、《一嚏千娇》等小说中,王蒙的探索似乎几近走火入魔。如,小说《来劲》如此开头:

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铭、香茗、乡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病、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十一月四十二号也就是十四月十一、十二号突发旋转性晕眩,然后照了片子做了B超脑电图血流图确诊。然后挂不上号找不着熟人也就没看病也就不晕了也就打球了游泳了喝酒了做报告了看电视连续剧了也就根本没什么颈椎病干脆说就是没有颈椎了。亲友同事们对立面都说什么也没有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么结实你这么衰弱哪能会有哪能没有病呢!说的他她哈哈大笑呜呜大哭哼哼嗯嗯默不吱声。^[7]

沉浸在语言狂欢中的王蒙开始为所欲为了,这种叙述已经背离了“革命作家”的身份。那个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激情澎湃向党倾诉“忠诚”的王蒙,无疑已经逐渐成了一个“远行的叛徒”。^[8]

二

一个人的思想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既决定于历史和时代,更决定于个体的实践和经验。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少共”革命生涯的经验主义者,王

蒙从自身的痛苦经历特别是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汲取历史教训,反思激进思潮,达到一种“清明的理性”。

王蒙对于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深刻的体悟和认识:“中国近百年以来,都常常在万众一心的兴奋灶下面使人们精神亢奋。”“壮烈能带来什么?为什么壮烈?祖国和人民需不需要你的这个壮烈?”“中国近百余年来,真是够壮烈的。烈士是伟大的。烈士出得那么多出得那么频繁,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么?”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一对孪生姐妹,只不过理想主义更带有明显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其实在这种表面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下面,掩藏的是激进主义话语霸权和乌托邦情绪。基于此,王蒙认定:“21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人们需要理想主义的光辉却不需要理想主义的偏执与狂妄自大。单纯的理想易于通向假大空的自欺欺人,假大空的结果反而使人们倒向另一个片面——怀疑一切与犬儒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王蒙对文学中激进姿态和虚幻的理想表达了异议:“一个国家生活愈正常气氛愈祥和作家就会愈多写一点日常生活,多写一点和平温馨,多写一点闲暇趣味。到了人人蔑视日常生活,文学拒绝日常生活,作品都在呼风唤雨,作家都在声色俱厉,人人都在气冲霄汉歌冲云天肝胆俱裂刺刀见红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怕是又大大的不太平了。”^[9]王蒙已经厌倦了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他对一些言辞激烈的批评家颇有微词,甚至委婉地拒绝人们对于“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的颂扬。

显然,王蒙与他的那些反对者的思想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其所持的价值理念也绝不相同。一个是属于革命时代的激进主义思想体系,一个是后革命时代价值多元的思想体系,因此隔膜、不理解在所不免。王蒙把自己定位于“后革命时期的建设者”^[10]。这一定位决定了王蒙的80年代思想的整体走向。“桥梁”即是一种建设性姿态,一种和解姿态。这种姿态使王蒙破除了革命时代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迷恋,他开始倡导宽容与温和,认同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实际上反映了后革命时代的尊重“差异”的价值理念和诉求。

尊重“差异”意味着消解“中心”、“整一”、“本质论”等价值观念。王蒙围绕文学和文化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主题,就是希望中国文学和文化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对抗走向和谐,从偏激走向中正,从蒙昧、狂热走向清明冷静。从这个立场出发,王蒙致力于沟通、缓和、平衡。早在80年代初,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引发各种现实利益冲突之际,王蒙率先提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80年代末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之时,他却敏感到学界中的“红卫兵遗风”的存在,呼吁人们透过文化进步的表面,看到值得警惕的偏激。在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与大多数学者不同,王蒙反对将“精英”与“世俗”对立,更反对将“精英”价值标准、理念绝对化、神圣化,强调“精英”与“世俗”的相通性、亲和性,强调人生价值的常态化和多元性。在王蒙看来,非黑即白、非敌即友、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是革命时代的历史遗物,当时代主题已经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和意识形态由泛政治化变为世俗化,激进主义变为现实主义,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需求由一元向多元发展,极端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已不再合适宜了。遗憾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多数人对这一变化的时代、变化了文学感觉和反应较为迟钝和滞后。在此情式之下,王蒙借助自己在文坛的影响力和高官身份,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辩护人,成为中国“后革命时代”文坛代言人。在他看来,跨越“革命时代”的文人须适时调整文化心态、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需适时转变文学观,需重新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需重新设计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否则要犯思想与时代错位、与生活错位的笑话。他身体力行,为文坛树立榜样。他坦言:我“不想充当振臂高呼、惊世骇俗的角色,当不了救世主”,著述之时偶尔会“玩弄文字游戏,有些甚至达到了常人所不能接受的程度。”^[11]

三

王蒙后革命诗学观首先表现为对革命时代“武器文学”“工具文学”价值观的超越。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开放的东西,而不是封闭的”:

文学是仁人志士的战场、十字架至少是试验场,文学又是智者弱者无所作为者清谈者自大狂自恋狂胆小者规避与逃遁者的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避难所。

文学是有为更是无为,文学是有为的无为,无为的有为。

文学是一种欢乐、文学是一种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是一种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12]

这是王蒙的文学宣言——后革命时代的文学宣言。对于文学的认识,王蒙由本质论走向了价值论。

革命时代的文学由于承载了过多的非文学因素,特别是屈服于“革命”的本质性要求,也就形成了“革命”对于文学自足性的忽视和压抑,文学必然论文“革命”这一宏大叙事的工具。而在后革命时期,随着文学的革命性价值诉求的淡化,带来了对人的价值、意义本体范畴的重新思考,汇集成一股主体论的人道主义思潮。具体而言,王蒙非常重视作品主体和创作主体。首先,注重作品。王蒙说:“本体永远优于观念大于观念”,“文学观念并不纯粹是,或者说主要并不是观念自身演绎发挥的产物,甚至文学观念也不仅仅是观念自身历史嬗变的结果。要探讨文学本身,即文学的本体。这里所说的文学本体,是指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学成果主要是创作的总和,是指这一总和所拥有的内容与形式,更是指文学所反映、所表现、所探求的宇宙、世界、人、人生。”其次,注重创作主体。王蒙认为:“忽视创作主体的作用就是忽视艺术规律……文学并不仅仅是记录,也不是捡拾雨后的蘑菇。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的心灵和智慧,赋予了日常生活、日常经验与体验以崭新的艺术生命。没有创作主体的作用,就没有艺术的灵魂。”^[13]这些极富鲜明时代特色的文艺理论思想有力地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作家的清规戒律,闪耀着后革命时代思想解放的光芒。

与理论上重视和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相一致,在创作实践中,王蒙同样有着自觉的追求。这在他的文学语言风格上表现尤为明显。语言不仅是一种符号系统,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语言哲学角度而言,革命时代的文学语言是一种透明的单一的坚固的所指系统,它的明确性、威严性、庄重性代表着革命意识形态诗学,而王蒙的小说则呈现出的是开放的动态的语义场,代表了一种多元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家们在描述王蒙的语言之时,喜用调侃、反讽、滑稽模仿、把玩、游戏、夸张、沉迷等词汇。的确,王蒙在80年代前期至90年代中期所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在语言上出现了铺张扬厉、变化多端、纠葛漫漶的特点,并推向极端,制造了不折不扣的语言狂欢的奇观效应。试看小说《踌躇的季节》中钱文这样“感恩”:

你应该谢天谢地感谢历史感谢世界感谢冥冥中的上帝,你一没有肝癌二没有入狱坐老虎凳往指甲肚上钉竹签三没有打光棍干撞墙四没有痔疮五没有降工资六没有平地摔跤摔折腰椎骨七没有生在刚果与卢蒙巴一道牺牲八没有与许多欧洲犹太人一样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化人炉被墙壁:勾吧一声,脑袋开花……如果你生在六十万年前,你也许与猿猴一起为老虎恐龙之属填了肚皮;如果你生在一百五十年前的非洲,你也许被卖到美国做黑奴泪眼汪汪被白人的皮鞋踢中鸡巴不但疼得满地打滚而且从此毁了好事枉去了人间走一回;如果你在十七年前生在中国生为女子,那么在东单广场北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皮尔逊强奸的说不定是你,你的妇科检查病历将会在国民党统治区所有报纸上全文公布,不如开个展览……^[14]

对于王蒙类似的语言,一些评论者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显得过于油滑、故弄玄虚、买弄才学,规避了现实。其实,深入语言巢穴,享受语言狂欢,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规避现实。中国当代社会高度紧张的一面,恰恰是以语言形式呈现出来的。语言结构“是一种投射到个体心灵之中对于复杂而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状况所做的确定的意识形态解

释”。^[15]在这样的语言中,一切固定的唯一的专制的语言和价值关联彻底瓦解,语言的所知与能指关系彻底分裂,成为一种飘忽性的存在,这既是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解构,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王蒙通过狂化式的语言,构建了一种新的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破除了单一性和明确性,走向了一种复杂性、不确定性。在这种语言面前,秩序和权威、中心论和本质论,均被解构,世界也呈现出新的图景,也创建了另一种语言和现实的关系。王蒙式的语言,寄寓了他对后革命时代文学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理解和想象,更是一种表现和达成。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坛代言人。王蒙是中国“后革命时代”代言人,他身上凝聚了中国“后革命时代”及其文学的闪光点,也汇集着中国“后革命时代”及其文学的困扰、矛盾和疑惑。他的言行、思想动向以及文化界对此反应,是中国“后革命时代”文坛的晴雨表。究其根底,世人批评他的作品或言论的主要原因,不是世人不认同,不肯定他文人和高官双重身份,而是世人未理性正视和探究中国“后革命时代”特点,未全面认知、准确定位他的中国“后革命时代”文坛代言人的身份。王蒙的成就毋庸置疑,他的文学艺术实践,直接推动了“文革”后文坛变局和文学走势,他的文学活动回响着一个新的时代蹒跚前行的脚步声。他的中国“后革命时代”代言人身份,是学术界勘察和研判“文革”后文学走向的一个立足点,是学术界用来研究和剖析“文革”后文化现象的一个经典个案。王蒙及其作品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一个标本。

参考文献:

- [1] 曹玉如. 王蒙年谱[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9:261.
- [2]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26-227.
- [3] 王 蒙. 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存(21)[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24-25.
- [4] 刘绍棠. 我看王蒙小说[J]. 文学评论, 1982(3).
- [5] 王 蒙. 不成样子的怀念·王蒙文存(17)[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211.
- [6] 王 蒙. 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王蒙文存(14)[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418.
- [7] 王 蒙, 来 劲. 王蒙文存(19)[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231.
- [8] 孙 郁. 王蒙:从纯粹到杂色[J]. 当代作家评论, 1997(6).
- [9] 王 蒙. 沪上思絮录·王蒙文存(2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220-221, 225.
- [10] 郭宝亮.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60.
- [11] 王 蒙. 道德乌托邦和价值标准·王蒙文存(2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312.
- [12] 王 蒙. 我的写作·王蒙文存(21)[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105.
- [13] 王 蒙. 学文偶拾·王蒙文存(2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43-50.
- [14] 王 蒙. 踌躇的季节·王蒙文存(6)[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278-279.
- [15]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2)[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440.

责任编辑:卫 华